

“文学重镇”

徐中玉先生有《我看周作人》一文，读后觉得义正辞严，极具个性，但多少还有些“观念先行”、偏颇生硬、或有可议论之处，现不揣浅陋提出来，以就教方家。

徐先生开首写道：“近年来，大谈周作人的贡献与什么什么成绩已出现了很多文章，他的书籍不但重新出版了，有些还分类加以选辑，或辑入有关书籍，到处可见，俨然仍是一位大家。而对他后来竟落水成为一个汉奸，多数文字往往只一笔带过，似乎已不算一个严重问题了。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怪事。”接着，摘引周氏在20世纪30年代初致其弟子俞平伯的信，印证：周当汉奸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其“早期的进步思想究竟进步到什么程度”，评论者、出版者不能“给今天的读者以一种错误的印象，即认为周作人仍是一位文学大家，甚至进步思想家”。徐先生最后说：“当日本至今还有一些高官不时在推卸侵略中国罪行的时候，对周作人的喋喋称赏能起什么作用呢？”应该说，这确是语重心长，含有大义的。

而今，周作人（以及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张爱玲等几位现代作家）的文章，犹如唐僧肉，谁都想来割尝，编来选去，不厌其烦，确乎有点滥了。但像过去那样长的时间里，书籍阙如，见不到片纸只字，也非正常。“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依附日本的行为不得原谅，但他的著述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价值”。钟叔河先生这个意见，我觉得还算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因此，为了学术研究，为了读者的欣赏（或吸取反面的教训），精选、精印一些像周作人这样的人虽有污迹、文却较佳的作家的文集，还是有必要的。相反，采用禁绝、封锁的办法来对待，则并不客观，也不现实。

关于周作人到底算不算一个“大家”，这似乎是一个纯学术性的问题，艺术上的因素应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很长时间以来，评论界及文学史界有一个基本的并且是趋同的“说法”，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而散文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以散文而论，左右翼作家都认可的郁达夫曾明确表示：“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郑振铎则推而广之：如果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的话，“无疑的”，“鲁迅先生和他（周作人，笔者注）是两个颠扑不破的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郑振铎：《惜周作人》）。冯雪峰说得更明白：“周作人是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见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此外，胡适、阿英、王哲甫、苏雪林等同时期的学者和作家，都表示过同样的意思；而鲁迅在同周作人彻底决裂的十年之后，即1933年2月，接受美国记者斯诺关于“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出现的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是谁”的采



周作人书法

访时，答案仍然是“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鲁迅）、陈独秀、梁启超”，把周作人排在第一位，他自己之前。由此看来，周作人的“大家”之名还是可以成立的吧。

周作人在“附逆”之前，特别是在“为他的 小品文的盛名所掩”之前，曾有过诸种卓然的“姿态”，即他是“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以至于介绍世界文学的译家而存在的。他的论文《平民的文学》（1918）、《人的文学》（1918）、《新文学的要求》（1920）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文学上的主张，对于当时的运动，也发生了很广大的影响。批评方面，《自己的园地》（1922）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基石，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学衡派’批评家的封建思想。《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贡献”；翻译方面，也贡献了“巨大的力”。（阿英：《周作人》）

周作人提倡的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适语）。此外，

在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宗教迷信、主张妇女解放、关注儿童成长、提倡正常的性教育等方面，他也都起到了突出的作用。这些正是当时思想革命的重要内容，其积极性或曰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贺凯在其《中国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述：“‘五四’以后，在思想界占有权威的是周氏兄弟，当时周作人如乃兄——鲁迅一样的是一个反封建势力的……战士。”

但是，一个在早期的文化思想战线上叱咤风云的骁将，如何逐渐退缩到“十字街头的塔”和书斋里养晦韬光，喝苦茶，写草木鱼虫小品，甘做“隐士”，并终至“落水”，成为民族的罪人呢？以研究“二周”闻名的学者舒芜曾深切地指出：“在周作人的精神结构里，理性、理智、知识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前期，正是用了这些，来照破封建的愚昧和迷信的黑暗。在他的后期，也正用了这些，来反对一切真理的权威以及真理和群众的结合。”（舒芜：《以愤火照出他的战迹——周作人概观》）鲁迅对乃弟曾有过一字评，曰“昏”。不管怎样，这里面可思味的东西是相当多的，值得人们进一步地挖掘，以示后人。

总之，人是人，文是文，二实俱在，不可否认。不能因为他抗战时期的“附逆”，就否定他早期思想进步的一面和作为现代文坛大家的事实；同理，也不能以其先前的贡献与文章的超拔，就一叶障目，漠视他丧失民族大义的那一节历史！

知堂门下

中国向来讲究师承，重视师道。所谓“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三者，君、亲、师也，于此可见“传道授业解惑”者的非比寻常。虽然此风习于近现代略有松弛，但衣钵传承到底也还受人珍视，因其丝丝缕缕之中，多可寻绎出耐人思味的人生乃至社会故实。

现代文坛大家周作人，自1917年9月执教于北京大学文科，近三十年中（期间一度兼任燕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校教授）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徒孙辈更是不可胜数。然而，为其称许、认作门下弟子的是哪一些幸运儿呢？1934年9月《文学》第3卷第3期所载《周作人与日记者谈话摘录》云：“记者又问在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很多罢，他答道不多，只二三个，现任清华教授的俞平伯，用废名这笔名的冯文炳以及冰心。”其实，还有一位沈启无氏也应算上，虽然他后来忤逆了恩师，被周作人逐出了师门。

现就周作人与这四大“金刚”的师生情缘以及四人的文艺事功等作些勾勒，以见现代文苑的人际与文脉。

（一）俞平伯

俞平伯，原名俞铭衡，浙江德清人，曾祖父俞樾（曲园老人）、父亲俞陛云都是一代名家，母亲许之仙亦精通诗文。俞平伯幼承家学，淹通博雅，1915年入北大文科学习，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5月，他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发表在《新青年》上，继作白话文，诗文并进，风靡一时，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中坚。所著新诗集《冬夜》《西还》《忆》和《雪朝》（与朱自清等合集），散文集《燕知草》、《剑鞘》（与叶绍钧合著）、《杂拌儿》、《杂拌儿之二》、《燕郊集》、《古槐梦遇》等，都曾广为流传。

在燕京、清华、北大等校执教之余，俞平伯考索、精研我国古代韵文发展的源流演变和诗词曲等艺术特性，结集出版了《读词偶得》《读诗札记》《清真词释》《唐宋词选释》《论诗词曲杂著》《古槐书屋词》以及《红楼梦研究》等著作，见解新深，文笔简隽，嘉惠后学，自不待言。红学研究为他赢得大名，但他也因此于1954年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当时由批判俞平伯到批判胡适，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俞平伯晚年在一篇名为《旧时月色》的文章中说：“《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可谓沉痛的确见。

俞平伯的新诗创作，能以旧诗的音节入白话，又能利用旧诗里的情境表现新意，写景抒情清新婉曲，旖旎缠绵，说理也能浑融而有诗味。如《晚风》：“晚风在湖上，无端吹动灰絮的云团，又送来一缕笛声，几声弦索。一个宛转地话到

清愁，一个掩抑地诉来幽怨。这一段的凄凉对话，暮云听了，便沉沉的去嵯峨着。即有倚在阑干角的，也只呆呆的倚啊！”文学史家唐弢对俞诗评论甚高，认为“以诗格言，颇近于温、李一路”（唐弢：《晦庵书话》）。

俞平伯散文的风格，总的说应归于以乃师周作为旗帜的冲淡自然、闲适清涩这一流派，但又别具自家面目。知堂在《杂拌儿·跋》中称，“平伯所写的文章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甚至赞许其“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周作人：《燕知草·跋》）。俞氏初期的作品，文思郁勃，描摹细腻，情致绵密，诗意葱茏。如《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湖楼小撷》《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眠月》等散文，莫不如是。

后来，俞平伯渐次改变他所娴熟的意象繁复、词彩华美的风格，着意追求一种“素朴的趣味”，创作出了《城站》《清河坊》《出卖信纸》等“全不着力而得妙肖”的简洁自然之文。学术小品及怀人之什，尤见语言的简劲和意境的醇厚，与乃师知堂的文风与趣味又近了些许。

（二）废名

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1922年考入北大预科，两年后转入英国文学系，开始接触莎士比亚、艾略特、哈代的作品，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短篇作品，并成为语丝社的成员。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期间，隐居故乡，在当地中小学教书。随后回北大，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改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吉林大学）教授，主要



废名早年留影

从事文学研究工作。

“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所云何。所写文章甚妙……只是不易读耳。”（周作人《怀废名》）知堂称赏其文章含“独有的意境”，本来是小说，却可以当小品散文读，而且“更觉得有意味”——“涩味与简单味”以及隐隐的“禅味”。现代派作家施蛰存也推崇其“耽于文章之美”，“遂以一个独特的文体家自别于一般作家”（施蛰存：《一人一书》）。可见，废名的人与文都有特别之处。

废名极崇敬周作人，周氏的言传身教在他身上颇见其效。在文学的趣味上，他逐渐与乃师心心相印，形神妙肖。他以清新、冲淡而略带涩味的散文笔调，描写我国中部农村平凡的然而又别有情致的人与事——古朴而纯洁的乡间翁媪男女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式的生存境遇。其郑重和欣慕的心情，素雅的浪漫主义气息，温馨的人情味，以及对清悠恬静的自

然景致的白描，为“五四”退潮期充满苦闷和感伤的文坛，吹进了一股别样的空气。虽然中立者的宁静姿态和作品的隐逸气冲淡了他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刻画，没有使其走进乡土写实流派的正宗境界，但是他将平凡人生的描写与诗情画意相交织、相融合，对现代小说的散文化和诗化作了卓有成就的艺术探索，在表现人物情感美、道德美，在挖掘自然的古朴美、意境美，在追求文字的奇崛、幽深和隽永等方面，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小说之外，废名又是“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境界的作者”（沈从文《沫沫集》）。不管是他的小说化散文（或曰散文化小说）、本义的散文，抑或谈诗说文之作，大抵是“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具有一种朴讷而静美的风韵。

同时，废名对佛学也有较为精深的研究，著有《阿赖耶识论》，专门探讨佛学中的唯识论等问题；并有哲学论文寄呈周作人，周氏曾说：“他又谈《论语》《庄子》，以及《佛经》，特别是佩服《涅槃经》，不过讲到这里，我是不懂玄学的，所以就觉得不大能懂。”终未直接回应，故没留下思想交流的材料。

然而，饶有意趣的是，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桃园》《桥》《莫须有先生传》等小说集、评论集，皆由周作人写序或跋，这在新文学史上实属仅见，亦足证他们师生情深意笃，确非泛泛。

（三）冰心

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1922年4月，周作人

经胡适介绍，受聘为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并担负现代国文方面的课（7月赴任，兼职近10年之久）。其时，冰心正在燕大文科读大三，赶上听知堂的国文课和接受毕业论文指导。虽然师生之谊只一年时间，但冰心很受周氏赏识和器重。

在“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下，1919年9月谢婉莹以“冰心”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随后有《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等揭示社会、家庭、妇女等人生问题的小说。此后，又有《鱼儿》《超人》《悟》等一系列作品。“热烈的时代气息和清浅的哲理思考相结合”，形成了其早期小说的基本格调——“微忧的爱”。正如她自己所形容，她所崇奉的“诗的女神”，“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而且，“诗文随时运，无日不趋新”。冰心由创作社会问题小说到创造心理问题小说，以至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总的说来，其作品多漾着“春气”，充满“爱的哲学”。她写母爱、儿童、自然、人生的忧郁往往转化为慰藉世人的微笑，使人感到似乎在郁闷的人生旅途中，悠然听到数声鸣啭于晴空下翠柳间的黄鹂的清啼。爱的浓雾，或许也多少遮盖了些批判的锋芒，但冰心的小说语言确是清雅隽逸，随物婉转，在她熟悉的小小天地里，写出了一种端庄而亲昵、敏感而微妙的诗情。

从1919年冬起，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影响，将自己“零碎的思想”不时用三言两语记录下来，结集为《繁星》和《春水》。这三百余首无标题格言式的自由体小诗，以自然和谐的音调，抒写了对自然景物的感怀和人生况味的思索，轻灵隽永，美感柔情，在当时的新诗坛上别具一格，惊动了万千读者，遂有“冰心体”之誉。

“独特的风格诚是不平凡作家的标志。”冰心清隽淡雅的艺术风格，在散文创作上尤其显著。1921年发表的《笑》，委婉地抒写了洋溢在心中的对于生活的爱，被认为是新文学初期一篇具有典范意义的美文。《往事》《寄小读者》《山中杂记》《归来以后》《小橘灯》《再寄小读者》等，都以一种细腻温柔而又略带着忧愁的情感、轻倩灵魂而又含蓄不露的笔调著称，语言亦愈见清淳。诚如郁达夫所评论：“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七十余年里，冰心笔耕不辍，文果丰硕，亦堪称奇。

（四）沈启无

沈启无，原名沈杨，江苏淮阴人。他也是燕京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比冰心略晚几年，听过周作人的课，后于燕大、北大任教，与周作人过从甚密，成为一名“小徒”（周作人语）。沈启无编有《近代散文钞》，由周作人作序，俞平伯作跋，颇得褒扬。还著有《中国文学史话讲稿》《放空》《笺校人间词及人间词话》《闲步庵读书随笔》等。文字略有乃师余绪。

北平沦陷后，沈启无不甘寂寞，写诗作文，常在敌伪刊物上发表。周作人之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与沈启无到南京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沈启无原想借周氏之力，谋取伪教育总署秘书长或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等要职，但都因人事纷纭而未果。

周作人安排沈启无担任伪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北大图书馆主任，沈启无并不满意。1943年4月，沈启无拟一人



沈启无早年留影

主编艺文社（归属于新民印书馆，社长为周作人）的两种刊物（《艺文杂志》和《文学集刊》）时，遭到其他人反对，周作人没有支持他，这使他衔怨更深，不免付之言行。1943年8月，第二届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帝国剧场召开，沈启无等人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在分组会上，日本作家片冈铁兵作了题为《中国文学的确立》的发言，对所谓中国“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进行猛烈攻击，并刊载于日文版《文学报国》第三期上。周作人后来知道“这所骂的似乎也就是我”，迅即写信、作文予以批评回击，同时断定此事幕后有人，此人非沈启无莫属。周作人十分恼火，但尚未发作。1944年2月，北京出现了一个“文笔社”，出版了一份单张的刊物《文笔》，第一栏是童陀的《杂志新编》，其中说道：“办杂志抓一两个老作家，便吃着不尽了。把应给青年作家的稿酬给老作家送去，岂不大妙。”并说《艺文杂志》代表老作家，《文学集刊》（沈启无主编）代表青年作家。周作人不久打听到，所谓“童陀”者，就是沈启无，而把老作家、青年作家对立起来的种

种说法，正好与片冈铁兵的发言相印证，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周作人随即向舆论界及朋友圈发出“破门声明”，文曰：“沈杨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想当年这位苦雨斋中的常客，张口不离恩师的教诲，周氏也曾以有他这样的弟子而骄傲，并且，1939年元旦周在家中被刺，正巧来拜年的沈启无还替老师挨了一枪，不料此时已势不两立、形同路人了。

师生的反目，在周作人的心中投下了极重的阴影，他多次检讨自己的“知人不明”，所作《关于老作家》《一封信》《文坛的分化》《遇狼的故事》《关于东郭》等文，不时用“东郭”或“南郭生”的笔名，足见对沈氏的耿耿于怀。

知堂于沈启无，一如鲁迅于高长虹，先亲后疏，始爱而终弃。这真是无独有偶，人世的悲凉，昆仲同受了。

沈启无1949年后供职于北京师院中文系，“文革”中悄然病故，与知堂的结局有些类似，冥冥中有照应否？

不朽名士风

近现代以降，皖籍文化名人辈出，光焰万丈，烛照远近，书写了弥足珍贵的页页华章。

台静农先生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霍丘叶集人，生于1903年，卒于1990年，字伯简，曾用笔名青曲、闻超、孔嘉、释末等。他的一生曲折富赡、多姿多彩，为现代著名作家、书画家、教育家、文史学者。早年在家乡霍丘及汉口、南京、上海辗转上完小学、中学。1922年到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1924年转到该校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所中师长有蔡元培、陈垣、马衡、沈兼士、刘半农诸先生，同学有董作宾、陆侃如、冯沅君、庄尚严等，学养和视野大长。1922年首次发表新诗《宝刀》，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台静农初识鲁迅，由于性情相投，两人关系密切。在鲁迅的影响下，台静农与霍丘老乡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曹靖华等六人在北京成立了文学社团——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多种，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1928年后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

塔者》，笔调简练、质朴而略带粗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为文坛时彦所重，被誉为 1920 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台静农还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内收有关《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共 14 篇，是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专集。曾参与编辑《歌谣》周刊，并编有《淮南民歌集》等乡邦文献。

早在 1928 年，台静农就在刘半农的引荐下，担任北京私立中法大学中文系讲师。1929 年由中法大学转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1931 年升任副教授兼校长秘书。此后又先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立厦门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齐鲁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他带着家眷辗转进入四川，失去教职，生活非常艰难。他先是到白沙国立编译馆任职，1940 年应聘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生活才安定下来。

因为作品思想激进，1928 年到 1935 年间，台静农先后三次被捕，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入狱。其间，他曾创作小说《大时代的小故事》及《电报》等。后与避居江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来往密切，成为忘年交。1946 年，为促进台湾战后文化的复归和重建，台静农赴台从事教育工作，先任台湾编译馆编纂，后执教于台湾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长达 20 年，奠定了台大中文系传承、开放与创新并重的学术传统，贡献卓著。

在教学之余，台静农潜沉于学术、书画与篆刻，谈史说艺，笔健情深，境界高雅，一派大家风范。晚年出版有书艺论文集《静农书艺集》、散文集《龙坡杂文》《台静农散文选》、小说选编《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学术论文集《静农论文集》、学术专著《中国文学史》（上、下）等。台静农是



台静农（前左）与友人合影

1949年后最受大陆文学界尊敬的去台作家之一。1972年台静农退休，仍任辅仁大学、东吴大学讲座教授。1990年因患食道癌在台北台大医院逝世，享年88岁。

1985年，台湾“行政院”颁发文化奖给台静农，对其献身文艺及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表示敬意，并作出这样的评价：早年致力于新文学创作，文风兼具犀利批判与悲悯胸襟，作品至今犹为文学批评界重视；其后专攻古典文学研究，阐扬文化精义，重要著作《两汉乐舞考》《论两汉散文的演变》《论唐代士风与文学》等，论断创新，精微独到，于传承文化，功不可没。

“新文学的燃灯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台静农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在鲁迅等左翼文化人的影响下，积极追求时代潮流，早年创作了反映青年恋爱自由的小说，后来也写过一些怀念革命者和宣传抗日思想的作品，但更重要的是写出了一系列富有写实意义、饱含乡土气息的小说，先后在《莽原》周刊和半月刊、

《未名》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这些作品以冷峻、沉郁的笔调，既白描出当时乡间百姓的艰难困苦，又深层次揭露了民族的劣根性，在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鲁迅称赞说：“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1928年，台静农将发表在《莽原》上的小说结集出版，最初拟定名为“螭蛄”，取《庄子·逍遥游》“螭蛄不知春秋”之意，鲁迅认为名字不够恰切，在对生命悲悯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意蕴。台静农尊重鲁迅的意见，将小说集重取名为《地之子》，这部小说集奠定了台静农在乡土小说界的地位。台氏晚年收进《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的15篇作品，有12篇出自《地之子》，他在“后记”中写道：“其十篇中的九篇都是以我的故乡为题材的，还保留了乡土的语言。这次读过后，使我有隔世感的乡土情分，又凄然的起伏在我的心中。”1930年，未名社出版了台静农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建塔者》，该书以大胆鞭挞新军阀的血腥统治而闻名，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

应该说，台静农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较好地师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写出了传统等级制度和封建习俗造成的乡村悲剧，而且写出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笔下的旧中国处处是闭塞、灰冷、残酷的景象，血雨腥风，鬼影幢幢，民不聊生，一幕幕人间悲剧。他在描写中融进了极为深挚的悲愤之情，这就更增加了小说的苍凉意境和悲剧色彩。现代文学史家杨义在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定台静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杰出的“乡土小说作家”，其小说“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